

# 辗转四迁,你不能不知的中大历史



## 西迁云南

“马思聪不仅用琴声为师生带来慰藉，而且常为前方将士募衣慰劳”

1939年2月底,经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,全校师生员工先后到达澄江。澄江县在昆明的南部,距离昆明56公里,是个古老的小山城。当时中山大学迁去师生员工有2千余人,学校无法集中开展教学,只能分散在城内城外,借用祠堂和庙宇上课。

小提琴家马思聪1937年来到中大,在文学院任音乐教授,到澄江后,因中大师范学院已成立,特聘为学院的音乐教授。他以音乐为武器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歌咏运动中。在澄江,他在继续创作抗战歌曲的同时,还经常举行小提琴独奏会,他那加听的《思乡曲》在月夜常让师生们泪流满面,他的音乐会也常常为前方将士募衣或慰劳受伤将士,马思聪的声名很快传遍昆明。

中大菁菁学子,尽管身处艰难岁月,却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。中大在云南澄江办学期间,学生组织的社团很多,学生们公演以爱国救亡为内容的话剧、粤剧,所得款项,用于修建剧院,被称为“抗战期间之兴奋剂”。而平时同学们则从事抗战、兵役、节约、储蓄、劳军义卖、卫生防疫等宣传活动,不曾停歇。

1939年下半年,在澄江的中大师范学院爆发学潮,1940年4月,邹鲁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请辞,被批准。中大师生强烈要求保持中大学术自由传统,反对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人接手中大,在此情况下,教育部任命许崇清代理中大校长。

## 回迁粤北

“炮火纷飞中,特约教授陈寅恪坪石‘语透辟’讲论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》”

1940年8月,中山大学受命在代理校长许崇清主持下,从云南澄江迁回广东省北部的东昌县坪石镇。坪石是个小镇,学校仍然分散在各地。学校除利用当地的寺庙、祠堂、空舍外,还新建房舍88座。

在粤北办学虽然分散且条件艰苦,但学校还是千方百计聘请了一批著名学者来校任教。他们中有李达、王亚南、洪深、梅龚彬、卢鹤、陈寅恪(兼职教授)等。为促进教学和学术活动的发展,1941年11月创办并出版了《中山学报》。到1942年度,中山大学的学生总数也由初迁云南澄江时的1736人激增到4197人。期间,中大还先后邀请了包括杨东莼、郑德鸿、英籍贾慧宜女士、美籍访华教授葛德石、英国都伦大学雷威克教授等国内外知名人士来校讲学,为中大开展海内外学术交流打开了一道大门。

法学院经济系著名教授王亚南、梅龚彬,常利用课堂教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,王亚南还在流离中创办了《经济科学》杂志。1941年6月22日,德国希特勒进攻苏联,政治学会即于6月26日晚在法学院礼堂举行“苏德战争问题座谈会”,李达、吕复等多名教授及同学数百人参加,“讨论情形极为热烈,正确独特之见解甚多”。炮火纷飞中,特约教授陈寅恪专程赶到坪石,从1943年7月1日起为中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学生讲论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》中的《五胡问题》等,“语透辟,阐发无遗”。中大在坪石为粤北地方的自然、人文研究,作出了极大的贡献,期间杨成志教授进行人文调查,撰有《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

告》;吴尚时教授以乐昌为中心进行考察,写成《乐昌盆地地理纲要》等;陈国达等著《广东曲江芙蓉山之石炭纪煤系》……时至今日,这些学术成果仍对粤北经济、文化发展研究,产生积极的作用。

坚守学术,艺术的激情也在石坪飘荡。“在学术界中甚著声誉”的史学研究会会在坪石举行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,请来了农学院教授、业余小提琴手蒲蛰龙。蒲先生欣然演奏数曲,“观众数百人无不谛听,咸称蒲先生之艺术精妙。”洪深教授再次受聘为名誉戏剧导师,在他指导下,中大剧团于1941年5月30日起,一连3天在学校礼堂公演《血十字》、《醉梦园》、《军用列车》、《求婚》、《优游岁月》等剧目,深受好评。大学的文化氛围并没因环境的剧变而荡然无存,它留着不灭的火种,薪火相传。

## 三分办校

“疏迁途中,卫梓松教授不受敌人利诱自杀殉难”

1944年秋,日军为打通粤汉线,向粤北进攻,坪石告急。在中大面临第三次搬迁前夕,中共地下组织抽调了200多名中大学生参加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,他们立即分批奔赴抗日线。1945年1月1日,日本侵略者进犯粤北,中山大学不得不再次迁校,学校一分为三:1.粤东各县:部分师生在代理校长金曾澄的率领下赴粤东办学。2.连县:部分师生在总务长何春帆的率领下到连县组成分教处,邓植仪为分教处主任。3.仁化:没有到粤东和连县的师生则到仁化县组成分教处,公推工学院院长陈宗南主持仁化分教处校务。

在迁离坪石时,工学院卫梓松教授来不及突围,不受敌人利诱,自杀殉难。附中教师陆兴焰、学生诸兆永在由坪石搬往仁化途中,遭日寇杀害。

英勇的师兄师姐们上前线去了,学校又分割成三块,国难家恨让中大师生更加激发了爱国救亡的激情,课坚持上,讲座继续开,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也从未停止,一直到抗战胜利。

## 终归故土

“回归原址,岂料历经坎坷,师生员工百余人罹难”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,中山大学师生员工与当地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10月,学校组成复员委员会,领导筹划返校工作。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,颠沛流离了7年的中大师生员工陆续从粤北、连县、仁化等地迁回广州石牌原校址。

然而在师生员工从各地陆续返回广州原校址的途中,竟又先后发生事故夺走了55人的生命,其中包括理学院数学系教授、文理通才黄际遇,他在从北江坐船返校途经清远时坠水罹难。潮籍师生林惠仙、黄光华等7人,从汕头乘士丹利祥发轮返校,途该轮发生大火,迫得跳入海里,不幸遇难。潮籍学生陈廷佳等47人,从汕头乘江南公司祥祥轮,该轮严重超载沉没,他们全部被江水吞没。

多次迁校不仅存留了中山大学不灭的火种,更借助从人民中汲取的精神力量,让文明薪火相传。历经艰苦磨练,流离中的中大学子尽管身处艰难岁月,却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。

1938年广州沦陷,国立中山大学誓不资敌,数迁校址:一迁粤西罗定,二迁云南澄江,三迁粤北、湘南,四迁粤东及粤西北、湘南。一波四折,颠沛流离,辗转于山区、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,利用当地祠堂、庙宇、围屋和自建简易房屋,分散办学,弦歌不辍。

## 首迁罗定

“在那段战火纷飞、风雨飘摇的岁月里,中大师生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”

1937年8月起,有“抗日大本营”之称的国立中山大学多次遭受日寇轰炸,损失惨重。学校拟定迁香港、广西、罗定等地的方案,未获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。直到广州沦陷时,学校才仓促迁往罗定。

中山大学选择罗定并非一时之举。早在1937年12月,校方便派出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张掖等人前往罗定进行调研,详细考察校舍、交通、物资供给、治安等情况,并专门撰写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,向校方汇报罗定的情况。在校舍方面,罗定县城及罗镜圩有17处公共场所可供借用或租用;交通方面,从广州乘船到南江口需31小时,随后乘车2个多小时便可到达罗定。在生活保障方面,报告指出罗定的米、肉、鱼、菜、柴等价格普遍低于广州,且可用河水和井水解决饮用水问题;夜间照明的电灯设施也为学校的复课提供了条件;治安情况则得到特别确认——罗定的安全形势较好。

经过多次的考察与细致安排,1938年10月17日和18日,中山大学发布的《国立中山大学佈告》703号和705号文,规定了迁往罗定的具体实施方案与秩序。

特殊的办学环境虽然简陋,但通过师生的努力与当地民众的支持,学校的教学、科研工作得以在逆境中稳步进行。随着中山大学的迁入,罗定也迎来了许多进步的教授和校友,诸如黄焕秋、俞福亲、萧隽英、董爽秋和何思敬等。

尽管罗定位置偏僻,但办学的日子也并非一帆风顺,日军的飞机轰炸时有发生,局势不宁。与此同时,随着逃难至罗定的人口越来越多,县内人口急剧增加,给本就紧张的生活配套设施带来了更大压力。诸多因素影响之下,校方决定再次迁校。1938年11月,中山大学计划从罗定迁往广西龙州,但在筹备启运时,接到新的情报:日军计划在广西北海登陆,接近龙州。迫于形势,学校迅速改变迁校计划,于1939年初从龙州乘越滇铁路赴滇,并最终选择澄江作为新的校址,继续坚持教育事业。



为声援北平一二·九运动,中大学生3000多人举行抗日示威游行



中大师生在临时校园共同进餐

来源:中山大学党委宣传部  
中山大学博物馆(校史馆)  
南方日报  
综合整理:樊晓澜